

L 172

整風

工作指導叢書
第三集



膠東聯合社出版

整 風

(工作指導叢書第三集)

1 9 4 2

整 風

(工作指導叢書第三集)

出版者： 膠東聯合社

經售者： ~~膠東聯合社~~ 各地
分銷處派銷處

每册定價三元五角

民國三十一年八月出版

目 錄

代序：

為什麼整頓三風是黨的思想革命.....	陸定一	1
領會二十二個文件的精神與實質.....	彭 真	8

二十二個文件：

整頓學風黨風文風.....	12
——毛澤東二月一日在聯校的報告——	
反對黨八股.....	27
——毛澤東二月八日在延安幹部會上的報告——	
關於整頓學風黨風文風問題.....	40
——康生兩次報告——	
中共中央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	44
中共中央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	47
中共中央關於延安幹部學校的決定.....	49
中共中央關於在職幹部教育決定.....	52
在邊區參議會的演說.....	毛澤東 57
改造我們的學習.....	毛澤東 60

反對自由主義.....	毛澤東	65
農村調查序言二.....	毛澤東	68
聯共黨史結束語六條.....		70
論黨的布爾塞維克化.....	斯大林	81
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第二章二、三、四、五節）.....	劉少奇	83
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	陳雲	114
反對黨內殘酷不正確的傾向.....		126
宣傳指南.....		130
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 及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		140
論領導與檢查.....	斯大林	143
論黨的紀律與黨的民主.....	列甯、斯大林等	148
論平均主義.....	斯大林	154
論幹部政策與幹部教育政策.....	季米特洛夫	156

為什麼整頓三風是黨的思想革命

陸定一

中央宣傳部四月三日決定中指出：「去年七月以來，中央關於劇性決定及其他決定，最近毛澤東同志關於反主觀主義、反宗派主義及反黨八股的報告，是黨在思想上的革命，是改正幹部及黨員思想、轉變工作作風的銳利武器。」在這裏，中央告訴我們，整頓三風應當看作是一個思想革命，一件很大的事情，一個嚴重的鬥爭。中央對於此次整頓三風的重要性的認識，必須成為我們全黨每一個同志，首先是每一個幹部的共同認識。只有成為共同的認識，然後才能在行動上求得完全一致，把作風整好，把黨的團結更加鞏固起來。

思想革命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方面是肅清過去曾經在某些時期統治過我黨，而現在尚殘留在黨內的一種錯誤的思想方法與實踐方法，即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同時是改造全黨八十萬黨員的思想。因為這八十萬黨員中有百分之九十是新黨員，而這些新黨員中又有差不多百分之九十是小資產階級或半無產階級（知識份子、中農、貧

農)出身。這些同志們都是願意爲共產主義而奮鬥的，但免不了帶着頗長的小資產階級自由思想，甚至封建思想的尾巴。這些東西在我們黨內也是不能容許的，如不改造，也將造成主觀主義、宗派主義與黨八股的毒害。因此，思想革命的目的，在於肅清過去殘留着的不正的三風與改造新黨員的思想，這是一方面。但肅清與改造的工作，是依靠什麼東西來做的？這唯一的是依靠馬恩列斯與我黨二十一年的優良的革命傳統——即中國的馬列主義，現在，是佔着統治地位的正風。以此作爲武器，去戰勝不正的三風，這是又一方面，這是正風的方面。只有發揚正風，才能整頓歪風。總起來說，思想革命是推翻一個思想方法、實踐方法；發揚一個思想方法、實踐方法。前者就是主觀主義的，後者就是辯證唯物主義，這就叫做思想革命。這種全黨性的觸及每個同志的思想清算的偉大的鬥爭，這種極廣泛極深入的黨內教育工作，二十一年來還是第一次，所以他意義決不尋常，他是個革命的一個鬥爭。思想革命要做到：在消極方面，要人人有發覺的嗅覺，遇到三風不正的東西會唾棄他，會抵制他；在積極方面，要大大宣傳辯證唯物主義，改造和改進每個幹部每個同志的思想方法、實踐方法，推進革命的事業。

我們的目的如此，但由於我們同志年齡不同，工作經驗多少不同，理論水平高低不同，黨性強弱不同，對於同一思想革命，會有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認識：有的認識得更深刻些，更全面些；有的淺薄些，片面些；有的認識這是多餘的事；還可能有個別的人討厭這個革命性的鬥爭，反對這個鬥爭，或者站在不正派的立場上想來利用這個鬥爭。因此，要把這個偉大的思想鬥爭做好，就需要有正確的領導、解釋、團結積極份子和反對不良傾向。

不熟悉黨的歷史，就不能盡知主觀主義之害，亦不能盡知辯證唯物主義之利。不在生活中碰過釘子，雖然讀書萬卷，亦不能盡知主觀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的分別究竟何在。不盡知利害，不盡知分別，則難求認識的深刻，也難求行動的積極與正確。

我們的黨，自誕生以來，已經廿一年了，這是極其緊張的戰鬥的廿一年。廿一年的戰鬥生活，給了我黨以極其豐富的經驗。我們經歷過勝利與失敗；高潮與低潮；「黃金時期」與「黑暗時期」，我們做過各種各樣的鬥爭，政治的、軍事的、經濟的、文化的、宗教的、公開的；我們經驗之豐富，在全世界各個兄弟黨中有他的光榮的地位。我們做過許多正確的事，曾犯過好幾次錯誤。我們的正確方面，使革命獲得成績；我們的錯誤，使革命受到損害。但就全黨的廿一年歷史來說，我黨在遠東會議之後，才在長時期中掌穩了舵，才使真正的馬列主義傳統獲得勝利與在全黨鞏固自己的基礎。只有在今天，才有可能把問題提到全黨思想鬥爭的高度來加以處理。

教條的主觀主義，其產生與發展，並非毫無來由的，其到了今天非被打得落花流水不可，也並非偶然。

處在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雙重壓迫之下，我國人民的革命要求是極其強烈的。我黨自誕生之日起，就沒有西歐社會民主黨改良主義的傳統，有的是國際工人運動中和中國人民運動中的革命傳統，這是很好的。直到現在，還是很好的。但我國在一方面是落後的國家，在另一方面是與資本主義發達了的西歐各國大不相同的國家；而我黨在一方面是革命的黨，一誕生就投入巨大的革命運動的火焰中，在另一方面又是年幼的黨，缺乏經驗，缺乏知識。我國最先進的革命家在蘇聯十月革命勝利的影響之下，認識了唯有馬列主義才能救中國，救人類，這種認識是完全正確的。但在廿一年前，我們的黨當然還談不上把馬列主義熟練的應用到中國來。我們一方面缺乏馬列主義的書籍，一方面又缺乏國內情形的調查研究；一方面實際問題迫切等待解決，一方面却缺乏掌握與運用馬列主義的能力。從認識馬列主義到善於運用馬列主義，曾需要長期的過程。

由於上述的情形，我們黨特別重視外國的，尤其蘇聯的革命經驗。「俄國革命有些基本點並非只有一個國家的、特殊民族的、單獨俄羅斯的意義，而是有國際的意義。」列寧的這句話是完全對的。俄國

的革命經驗曾給與我國的革命運動以極大好處，曾起了指導作用。例如「兩個策略」一書，曾在反陳獨秀機會主義的鬥爭中起了極大的理論作用。蘇聯的建軍、建政、土地、財政、經濟工作等經驗，曾在六次大會後給了我國的革命運動以極大幫助（當時我們是毫無建國經驗的）。布爾塞維克的組織原則和兩條戰線上的鬥爭，曾使我們年幼的黨經得起大革命失敗的震撼。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提出，曾啟發了我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產國際的指示與外國經驗應用得正確，就使馬列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際經驗結合起來。

但一直到遵義會議為止，十三年中（一九二一——一九三四）我黨雖然積聚了許多經驗，獲得了許多知識，在理論與實際結合的問題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績；然而並不是全黨都善於運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與方法。許多同志重視外國的革命經驗，又不善於運用外國的經驗到中國革命的實際中來，不善於把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與馬列主義的字句分別開來，這裏就有了漏洞，使教條主義有隙可乘。陳獨秀主義固執着「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的無產階級必須聯合資產階級」，把它作成教條，過份強調聯合的必然性，結果走到大革命後期「一切聯合，否認鬥爭」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國共分裂期間，八七會議反對陳獨秀主義，八七會議前後，舉行了南昌秋收及廣州三次起義，都是正確的；但許多人沒有看到中國革命發展不平衡的特點，又在一九二七年冬季與一九二八年春季發生了盲動主義錯誤。六次大會反對左傾盲動主義與右傾取消主義，指出了中國革命的不平衡性和嚴重性是正確的；但大會二年之後，李立三把「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一書當了教條，機械的應用於一九三〇年的中國，忘記了中國革命的特點（連中國革命現在還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不是社會主義革命這一點也不知道），結果形成了立三路線的錯誤。反立三路線的鬥爭是正確的；但蘇維埃後期却又發展成爲更加極端的教條主義，把中國的特點忘掉，又一次把左傾機會主義再來重複一次。總計起來，在國共分裂後

的八年（一九二七——一九三四）之中，三次錯誤，性質是同樣的，程度則有不同。他是左傾的錯誤，他與陳獨秀主義相同，忽視中國革命的特點；他又與陳獨秀主義相反，過份強調鬥爭的必然性，在蘇維埃後期，發展成爲「一切鬥爭，否認聯合」的左傾機會主義，在這八年之中，教條主義沒有被清除，始終在或多或少的作祟，最後把一切真正馬列主義傳統壓下去，發展成爲教條主義在蘇維埃的統治。這種教條主義「容易裝出馬恩列斯的面孔嚇唬工農幹部，把土包子俘虜起來，充作自己的用人，而工農幹部不易識破他們的面孔；也可以嚇唬天真爛漫的青年，把他們當做俘虜」。列寧指示：「俄國革命的某些基本點有國際意義。」但並未說俄國革命的一切各點都可以依樣葫蘆用於任何時間任何地方；相反的，列寧指出：「應當考察研究探索揣摩和捕捉民族的特點，這一切先進國家（而且不僅是先進國家）在目前歷史階段上的主要任務，現在要把一切力量一切精神集中在下達一個步驟上面，這個步驟就是要找到轉變到無產階級革命或接近於無產階級革命的形式」。中國革命在現階段是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不是社會主義革命，這個革命有長期性、不平衡性、民族民主的兩重性和中國社會兩頭小中間大，因而發生許多複雜情形的特點，應該抓住這些特點來處理問題。教條主義與這相反，以背誦馬恩列斯的成語爲光榮，以不懂本國本地此時此刻爲光榮。對於條文上的一字一句則斤斤較量，可以爭得面紅耳赤；對於實際工作，則一竅不通，亂出號令，亂發脾氣。

主觀主義是經不起事實考驗的，爲要繼續主觀下去，只有硬來，宗派主義和戴八股必然隨之發生。越是主觀得厲害，家長制度、打擊政策、派別活動，也就愈加厲害，咬文嚼字、裝腔作勢、橫蠻武斷，也愈加厲害。

在蘇維埃運動後期，這種主觀主義宗派主義戴八股曾統治着我們的黨，直到遵義會議才止。但就在遵義會議以後，這些東西還在襲擊我們黨、損害黨。我們黨現在是遵義會議之後七年之久了，我們才來

清算它，這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這三股歪風是有他歷史根源，現在雖不是全黨統治的東西，但他還經常作怪，還在襲擊我們，因此有整頓之必要，有抵制之必要」。

我們黨廿一年中，在遵義會議以前十三年半中，黨的領導路線大部份時間是正確的，但是陳獨秀機會主義半年，立三路線的半年，蘇維埃後期的三年，則是錯誤的。在盲動主義期內，雖然總路線是對的，但在部份策略上犯了盲動的錯誤。在遵義會議以後，整整七年半的期間中，我們黨的總路線，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之下，始終是正確的。在這個期間，我們完成了兩萬五千里長征，結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在敵後堅持了五年抗戰，在全國抵擋了兩次反共高潮，在黨內則肅清了張國燾主義，糾正了在抗日統一戰綫中的右的與左的錯誤。如果反過來想想，假使我們的總領導是主觀主義的，那末情形會怎樣呢？假如我們對於日寇的戰略不是主張毛澤東同志所說的持久戰，而是主張速決戰；假如我們對於大資產階級反共派或者只有鬥爭無聯合，或者只有聯合無鬥爭，或許抗戰的情況就不堪設想。不但如此，在毛澤東同志的四部著作中，在中央的許多的決定指示中，可以看見我們黨的中央確是掌握了辯證唯物論的思想方法，已經有本領善於把馬列主義應用到實際中去了。我們黨日益深刻的發現中國社會內在實情及其發展規律，不是忘掉中國的特點，而是更確切的掌握了這些特點，並依據中國的特點，發展了馬列主義，因而在工作中就取得了成績。遵義會議以來，七年半的成績，不但替我們準備了現在舉行廣大深入的思想鬥爭的思想武器，也替我們準備了研究的物質基礎。有了這七年半的歷史，我們就不僅在事實上看見什麼叫做主觀主義，而且也在事實上看見什麼是辯證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這個哲學名詞，這個抽象的概念，這個難以捉摸的東西，現在已經被解釋以活生生的事實，被充實以血和肉，變成了通俗的、中國化的、人人可以了解的東西了。馬列主義被發展了，被推進了、我們的黨已經把辯證唯物主義，由

「自在之物」變爲「爲我之物」。

但這並非說明我們黨在思想問題上一切解決，高枕無憂了；相反的，我們還有事情要做，還必須做。應該深入的思想鬥爭，因為我們「所了解者，仍然都是粗枝大葉的漫畫式的，缺乏系統的周密的了解，主觀主義形式主義的作風並未澈底消滅」。（調查研究決定）如果回顧我黨歷史，就可以知道，要使主觀主義永遠絕跡不再出現，最重要的條件，倒不是把主觀主義者「懲」他一頓，「懲一警百」；而在乎使主觀主義無隙可乘，失去「誰衆取寵」之「衆」，在乎消滅我們黨內的「幼稚無知」，在乎人人能依照正確的方法來思想，來工作，來處理問題。可以有三種態度：一種是完全科學的態度，即辯證唯物主義的態度，這就是一切由實際出發，詳細周密、實事求是的態度。一種是不科學的態度，即主觀主義的態度。還有第三種是不完全科學的態度，就是不精細、不周密、多多少少滿足於粗枝大葉的態度。主觀主義無論怎樣精煉，其對實際情況的了解，總是沒有調查研究，總是粗枝大葉，一知半解的。粗枝大葉對於主觀主義是親密的夫妻，但是，也可以有時雖從實際出發，但對於周圍情況、對於歷史、只有泛泛的了解，沒有作或沒有決心去作周密的系統的了解，只求大致正確，不求完全正確；這種態度，雖其立場一般是唯物主義的，然而站腳不穩，道理說不透澈，遇到精煉的主觀主義，就不能去克服他，反被他壓倒，甚至成爲主觀主義的俘虜，遇到情況變化，遇到新問題，因為對於新情況並無調查研究，自己的認識，沒有跟着情況的變化而變化，也就變成了主觀主義。這種態度是非常危險的。可以肯定的說，任何部門、任何地方、任何工作，如果沒有情況的調查研究，沒有歷史的調查研究，沒有工作經驗的積累，沒有有的放矢的理論學習，那個部門、那個地方、那個工作中，就會有發生主觀主義的可能，或者是教條的主觀主義，或者是經驗的主觀主義。必須不但反對主觀主義的立場，並且必須在一切部門、一切地方、一切工作中，反對粗枝大葉的方法，反對不科學的態度，同時反對不完全科學的態度，實行「沒有調查

沒有發言權」的名言。

我們的同志，自願成爲主觀主義者的人是極少極少的，但是「現在我們同志中，還有着粗枝大葉，不求甚解的作風」。(毛澤東)我們要永遠塞住可以發生主觀主義的漏洞，必須要求每個幹部的身上去掉這種粗枝大葉不求甚解的作風。這不是少數人應該進行的工作，而是人人應該做的工作。這是件大事，這是黨的事，這是每個黨員的大事，人人有份的事，光「懲」一下主觀主義是不夠的，一定要改造和改進每一個同志的思想方法，學會自覺的以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方法來處理一切實際問題，這就是思想革命所要求做到的事。整頓三風就是這樣的一個思想革命。這個思想革命的成功，將是我黨完成其由幼年到成年的大飛躍。

(五月七日)

領會二十二個文件的精神與實質

彭 真

中央決定必須學習的二十二個文件，「是改正幹部及黨員思想轉變工作作風的銳利武器」，是整頓三風的銳利武器，我們必須深入的研究，熱烈的討論，真正領會貫通它們的精神與實質。

什麼是精神與實質？二者是一個東西還是兩個東西？爲什麼必須領會貫通它？——在這裏，也只說在這裡，精神與實質的意思是一樣的，是與文件的字句相互對照來說的；它是指文件中分析解決問題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說的。我們領會了它，便可能依據它、運用它，

來了解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繫，來預見事變的發展進程。就是說，有了它，不僅可以知道事變在目前是如何發展和向那裡發展，而且可以知道事變在將來應當如何發展和向那裡發展，而使我們在任何環境下都可以確定正確的方針。換句話說，我們所以要領會它，就是爲了要實際應用它，把它們變成我們自己的武器，自己的箭，射起來得心應手的箭，好來百發百中的射擊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來改正我們的思想，改造我們的工作，總之，來解決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

究竟怎樣才算領會貫通了這些文件的精神與實質？有什麼標準？顯然的標準是實踐，是會不會實際應用。

如果我們研究了這些文件之後，能够運用它來反省自己的工作，來反省自己的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歷史，並且改正了自己的思想，改造了自己的工作，又能够依據它來檢查自己有關部門和有關地區工作而改造之，揭發並且糾正了其中的歪風，那我們就是真正的領會貫通了。反之縱然能把他的字句背得爛熟，甚至像禿和尚念經一樣，背得純熟，却仍然是一竅不通——因為實踐是真理的標準，而你卻不會實際運用，不能實踐啊。

可是具體講起來，究竟什麼是我們文件中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呢？

我們的立場是近代無產階級的立場，是人類歷史中最革命的階級底立場，是解放全世界被壓迫階級被壓迫民族，因而也是解放全人類的立場。

我們的觀點，是徹底的唯物論的觀點，即辯證唯物論的觀點。因為只有辯證的唯物論，才是徹底的唯物論，才是完全的唯物論。如人所共知的事實，機械的唯物論是不完全的唯物論，是不徹底的唯物論。它的唯物論往往有一定的限界，超出此限界，機械唯物論即成爲唯心論的俘虜，成爲唯心論者。費爾巴赫就是一個很好的典型。

我們的方法是徹底的辯證法的方法，即唯物的辯證法。因為只有唯物的辯證法，才是徹底的辯證法，才是完全的辯證法。同樣這

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實，辯證法在唯心論者的手裡是受着嚴格的拘禁的，受着不可避免的限制的，就是最徹底的唯心論的辯證法者黑格爾，在某種範圍內，他仍然是機械的、形而上學的。如他的「絕對觀念」「最高理念」是並不受辯證法的法則支配的，他是黑格爾的「上帝」，是永遠不會消滅的創世主，既是說，他不是經過辯證法的發生發展和消滅過程的。

立場是無產階級的立場，觀點是唯物論的觀點，方法是辯證法的方法，三者又是統一一致的。那麼，問題不是再簡單沒有嗎？爲何還要在每個文件中、每本書籍、每篇論文中，去費盡腦力的領會它們的立場、觀點與方法，即他的精神與實質呢？

因爲我們的立場雖然只有一個，雖然是確定不移的，但是隨着革命階段的不同，隨着具體的問題，具體的經濟的和政治情況的不同，在處理問題時却有其不同的表現，同時無產階級的立場，在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中，和在反資本主義的社會革命中，他的表現的形式是很不相同的。在這一個國度和那一個國度裏的表現形式又不相同。在勞資鬥爭中和在資產階級反封建地主階級的鬥爭中又不相同。以中國來說，我們的階級立場，在實質上來說是確定未變的，但是他在大革命時代和在內戰時代的表現形式不同，在抗戰時期和內戰時期的表現形式又不同。從立場的表現形式來看，正確的立場固有其隨遇而變的及其多樣的表現形式。錯誤的機會主義的立場，也同樣甚至有更多的隨遇而變的表現形式；但是就其實質來說都是百變而不離其宗的，始終都代表着一定的階級——我們代表着無產階級，而一切錯誤的機會主義的立場則代表着其他異己的階級。

我們的觀點是唯物論的觀點，這是不變的。但是隨着問題的不同或者同一問題又隨着其所處的歷史時期底具體的經濟的和政治的環境的不同，都有其極不相同的具體表現。因此，就其所表現的形式來講，也是千變萬化的。舉例說：當我們考察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時，我們認爲「認識中國社會的性質，就是說認識中國的國情，乃是認識一切

革命問題的基本根據」。但是當我們考察中日戰爭時，我們却又必須把日本帝國主義和中國相提並論的加以考察。認為「中日戰爭，不是任何別的戰爭，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與帝國主義的日本之間在廿世紀四十年代進行的一個決死的戰爭。全部問題的根據就在這裡」。

（論持久戰）而當我們考察抗戰中的中國國內關係並且決定黨的具體政策時，則又認為現在不但和內戰時期而且和大革命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根本不同。認為目前「在中國兩大矛盾中間，中日民族矛盾——是基本的；國內階級矛盾——是從屬的。一個民族敵人深入國土，這一事實起着決定一切的作用」。就是說，他是決定黨的具體政策的根據。所有這些例証，都可以說明：（一）我們在分析處理一切問題時，總是從客觀的具體情況出發，總是從實際出發，而不是從主觀的願望或其他主觀的什麼東西出發。這種觀點是始終如一的，是一個徹底的唯物論者的觀點。單就這一點上來說，也可以說是很簡單的。但是：（二）這種觀點的具體運用時，又隨着問題的不同和具體情況的不同，而變化無窮，要想真正領會並且熟練的運用他，却又並不是一件易事。

其次講到我們的方法。從它的實質來說，反正是辯證法的方法，一句話可以說完。但是具體運用起來，却又千變萬化，極其洋洋大觀的。就是說，我們若就辯證法的本質來說，那末「統一物的分裂和牠的矛盾的各部份的認識是辯證法的真骨髓」，因為「辯證法本來就是研究矛盾的東西」，因為「辯證法在其本義上說來是對象的最本質的矛盾之研究」。（列寧）那末粗看起來，似乎是再簡單沒有了。但是，真正具體的充分的應用起來，却是一件頗不容易的事。舉例來說：如把中日戰爭的雙方，即中國與日本各方所具有的矛盾的強弱優劣形勢加以分析綜合的考察，如（論持久戰）把中國抗日統一戰線營壘中的親日派、頑固派、中間力量和進步力量加以區分，並分別加以周密的考察……對於頑固派的抗日又反共的兩面性及其在抗日與反共兩方面又各自具有其兩面性等加以分析，並且全面統一的正確掌握這些矛盾等等，在今天似乎已經成了常識了，但在全黨達到如此認識的發展過程中

，不但經歷了無數的鬥爭和困苦，而且是支付了不少的代價的。

又如中央宣傳部四月三日的決定中對於領導者與被領導者的關係，批評者與被批評者的關係，領導與民主的關係，成績與缺點、錯誤與正確的、主要的次要的以及「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等關係的正確處理，在中央已經指出之後，從形式上來看，似乎也是很簡單的事情，甚至也許有人以為這已經是老生常談了，但是全黨達到這樣的認識並且能夠用這樣的方法來全面的看問題、處理問題，却是無數次的經驗的結晶，全黨支付了無數的代價，方才獲得的一點辛勤的果實。但是即便是這樣，要真正領會他們的精神與實質而圓滿靈活的應用於實際貫徹到全黨，仍然是需要很大的努力的，也並不是一件易事。

二十二個文件中的立場、觀點也好，方法也好，就其本質的共同一致之點來說，也許似乎是很簡單的。因為他是百變不離其宗的；但是，就其實際的應用，就其表現的各種各色的具體情形來講，却又是變化無窮，是有無限豐富的內容的。真理常常是具體的，如果不滿足於一般的公式，而是要真正的領會他們，那末便不是咬文嚼字，背死書的教條主義者的讀書方法、學習方法所能解決的。必須以企求實際應用的精神，逐件的精讀，深入的研究，熱烈的討論，反復的深思熟慮的、細心的體會，才能真正領會貫通而實際應用之，同時，也一定能夠真正領會貫通之。（五月十日）

整頓學風黨風文風

毛澤東

——二月一日在黨校的報告——

黨校今天開學，我慶祝這個學校的成功。
今天我想講一點關於我們黨的作風的問題。